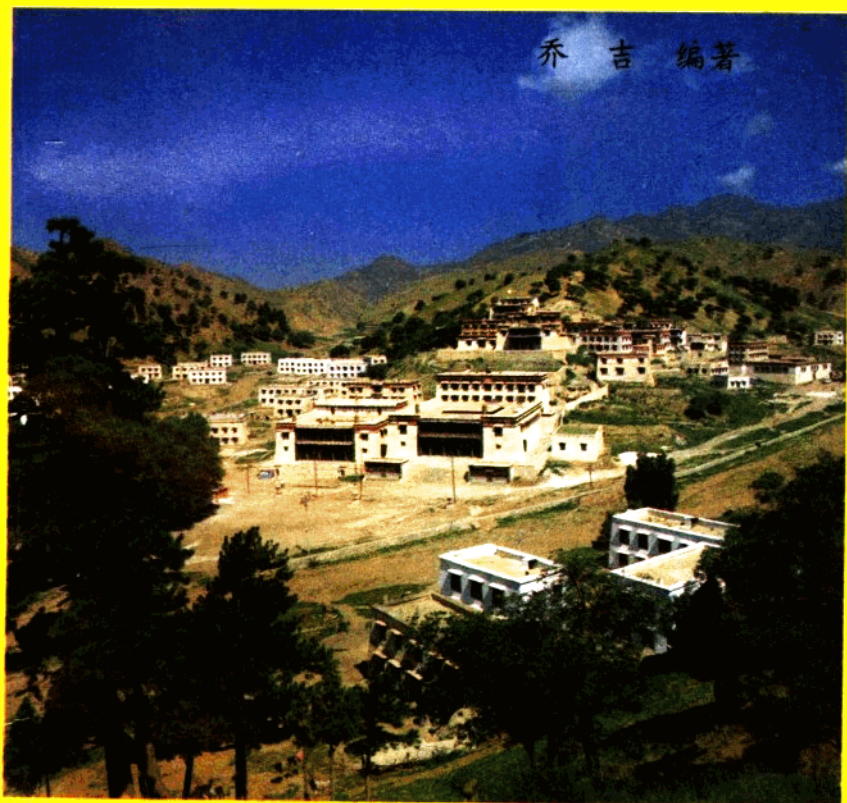


· 内蒙古历史文化丛书 · 林干 主编

内蒙古寺庙

乔吉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准格尔召

《内蒙古历史文化丛书》序

王 群

内蒙古地区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块美丽富饶的地方。根据考古发现,无论是人类化石属于新人(智人)阶段的河套人、扎赉诺尔人,还是大窑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都说明内蒙古地区是我国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内蒙古地区是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活动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汉族和少数民族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结成了种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联系,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共同开发了内蒙古地区。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文化,了解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变迁,对于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增强各民族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内蒙古大学林干教授长期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多年，且成果累累，造诣颇深，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地位。为了把学术研究成果普及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掌握，他邀集这方面的专家，主编了《内蒙古历史文化丛书》。这套丛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民族观为指导，以事实为依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文物古迹、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历史人物、历史名城、寺庙等各个方面，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文化，是一套对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的好书，体现了古为今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精神。

林干教授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希望社会科学界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联系实际，搞好科研，多出成果。并且都能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知识变成群众的知识，使社会科学研究贴紧现实、贴紧群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内蒙古历史文化丛书》

编撰说明

（一）为了弘扬祖国历史文化和内蒙古地区历史文化，对各级干部、各族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情、区情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在内蒙古党委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党委秘书长韩茂华同志的具体协助下，我主编了这套《内蒙古历史文化丛书》。

（二）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导，力求科学性、思想性、学术性、知识性和通俗性相结合；既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有所创新，具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大专学生的课外读物、中青年干部和教师的自修课本和政治学习参考材料。

（四）丛书先出十种，其具体书目及作者如下：

（1）《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

林干，汉族，内蒙古大学教授；

（2）《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

马大正，汉族，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华立，汉族，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3) 《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

林干，

马骥，汉族，内蒙古大学副教授；

(4)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

叶新民，汉族，内蒙古大学副教授；

(5) 《一代天骄》

薄音胡，蒙族，内蒙古大学副教授；

(6) 《内蒙古历史文化遗迹》

丁学芸，汉族，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7) 《内蒙古历史名城》

李逸友，汉族，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8) 《内蒙古寺庙》

乔吉，蒙族，内蒙古社科院副研究员；

(9) 《内蒙古少数民族风情》

徐世明，蒙族，赤峰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

毅松，达斡尔族，内蒙古社科院达斡尔族研究室主任；

(10) 《蒙文历史文献概述》

包文汉，蒙族，内蒙古大学副教授，

乔吉。

（五）内蒙古的历史源远流长，内蒙古的文化丰富多采。丛书虽以“内蒙古历史文化”命名，但绝不是仅仅用十本小册子就能把内蒙古地区古往今来的历史文化全部反映出来和介绍清楚。故对于这套丛书的十种书目略加说明。

（1）上列十种书目，可说是这套丛书的第一批，将来在适当的时间，如有必要，还会编写和出版第二批或第三批，以便把内蒙古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多采的文化，更广泛、更深入地加以反映和介绍。

（2）由于内蒙古地区为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少数民族在此活动，而近百余年来，有许多外国学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有意歪曲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挑拨中华各族、特别是古代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故古代北方民族及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文化这个学术领域，一向是、直到现在仍然是马列主义者和反马列主义者政治思想斗争的重要战场。根据当前政治思想教育的需要，这套丛书先从古代历史文化开始，结合内蒙古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进行选题。至于内蒙古近现代的历史文化，除了间或有必要涉及者外，暂不在这十本书中介绍。

（3）这十本书的书目，也没有严格按照学科体系或学术分类进行挑选和排列，而是根据当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情、区情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的实际需要拟定的。这十本书的内容虽然互有关联，但并没

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因为这不是一本书的十个章节，而是一套丛书的十种书。且因每本书分别由一位或两位作者执笔撰写，而这些作者都是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别具一格的写作方法。因此这十本书，不求内容上的相互衔接和表述上的风格一致，而以不离“内蒙古历史文化”这个大范围及不悖于这套丛书的出版宗旨为近是。

承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群同志为本《丛书》撰写序言，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林 干

1992年冬书于内蒙古大学

前 言

这本小册子为应《内蒙古历史文化丛书》主编林干先生之约而写的。内容主要介绍内蒙古地区历史上有名的寺庙，同时也涉及了佛教传入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梗概。内蒙古地区，自元代开始藏传佛教传入以来，截止民国为止，先后修建了一千二百余座寺庙，但由于各种原因，后来被毁坏的不少，其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毁坏尤为严重。本书所介绍的60座寺庙，大都是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幸运地遗存下来的。写这些寺庙历史时所依据的资料有几个方面：其中主要以今内蒙古地区各盟旗的“文史资料”及“地名志”以及寺庙资料为依据；还有一部分为清代内蒙古地区高僧们留下的一些寺庙的蒙文资料；此外还有一些寺庙的情况，是我亲自前往实地观察和考查得来的资料。因而本书中叙述的有关寺庙历史情况，除了我个人所收集的一部分蒙文资料而外，基本上汇集了他人之成果。我在这里对这些成果的主人们表示感谢。

至于佛教传入内蒙古地区历史及其特点本书也写

了几章。我对佛教问题本非内行里手，但近十余年来我在研究蒙文历史文献过程中不断发现有关这方面的有趣资料，这些资料恐怕也自有其价值，所以就大胆地利用了这些资料。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研究蒙古族佛教，除了蒙文资料而外汉文、藏文资料和其它外文资料也极为重要。

乔 吉

1993年春书于内蒙古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目 录

《内蒙古历史文化丛书》序.....	王 群
《内蒙古历史文化丛书》编撰说明	(1)
前言	(1)
第一章 佛教在内蒙古的流传和发展	(1)
(一) 蒙元时期蒙古人与佛教的接触	(1)
(二) 佛教在明代漠南蒙古的传播	(16)
(三) 佛教在清代内蒙古地区的发展	(27)
第二章 内蒙古现存的主要寺庙	(42)
(一) 呼和浩特地区的寺庙	(42)
(二) 包头地区的寺庙	(62)
(三) 阿拉善地区的寺庙	(66)
(四) 巴彦诺尔地区寺庙	(75)
(五) 鄂尔多斯高原的寺庙	(77)
(六) 乌兰察布地区的寺庙	(80)
(七) 锡林郭勒草原的寺庙	(84)
(八) 昭乌达(今赤峰)地区的寺庙	(90)
(九) 哲里木地区的寺庙	(100)
(十) 呼伦贝尔草原的寺庙	(106)
(十一) 兴安南北的寺庙	(107)
第三章 寺庙建筑及主要神佛	(110)
(一) 寺庙建筑特点	(110)

(二) 寺庙中的主要神佛·····	(114)
(三) 护法神祇像·····	(126)
(四) 传承师祖像·····	(131)
第四章 内蒙古佛教发展的特点 ·····	(135)
(一) 佛教与萨满教·····	(135)
(二) 佛教与民间信仰·····	(139)
附 录 蒙汉对照寺庙名称表 ·····	(146)

第一章 佛教在内蒙古的 流传和发展

众所周知，到了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是蒙古人从政治上加强及其帝国开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随着蒙古军事势力的不断扩张，蒙古人一跃而成为中世纪最有势力的民族。蒙古人面对许多外族的文化和新奇而不同的生活方式，不能不产生爱慕，甚至采纳。对外来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

蒙古人在他们的对外扩张中，与中原地区和西藏地区佛教的接触，对蒙古人来说，改变其固有的萨满信仰（萨满教为一种原始宗教）以及后来其全民族变成为藏传佛教的忠实信仰者，是有直接关系的。

（一）蒙元时期蒙古人与佛教的接触

蒙古人究竟何时与佛教进行接触，这似乎是无法确切回答的问题。但就蒙古人留下的现存史料而言，记载成吉思汗时已经同西藏的宗教领袖人物开始有交涉之事也颇不少见。然而这些记载，均不是当时人所见，更不是当时的文献，而均属时代比较靠后的作品。同时在我们看来，这一类作品往往包含着错误，好多都是后人的笔误，甚至是喇嘛们虔诚的

虚构，因此就其可信程度而言，不会引起人们多大的注目。然而汉地（中原）佛教的大师与蒙古统治阶层的接触，似乎是在藏传佛教之前。这一点我们可用当时的或是比较可靠而靠前的材料为依据。《元史·释老传》说：“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这大概不是没有根据的。据元代汉文文献，在元朝建立之前，已有佛教徒在蒙古汗廷中活动的记载，而这些活动绝对不会完全落空的。在成吉思汗时，与蒙古汗室发生密切关系的，是汉地佛僧海云法师印简。据元人念常所著《佛祖历代通载》，海云法师是唐代临济义禅师所创临济宗支派的第十六世法座，生于金泰和二年（1202年），卒于蒙古宪宗七年（1257年），他青年时是中观禅师的弟子，时人称他为临济中兴名匠。元代著名政治家刘秉忠（1216—1274）就是他的弟子。海云的一生活中与蒙古有密切关系的活动有下述几件：

当他十三岁（1214年）的时候，正是成吉思汗伐金的第三年。蒙古军陷宁远（今山西五寨县北），海云曾于“稠人中亲面圣颜”。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海云等亲自晋谒成吉思汗。可是这似乎不确，因为当时南进的蒙古右军统帅是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故念常所谓“亲面圣颜”，当是窝阔台。过五年后即1219年，蒙古大将木华黎奉成吉思汗之命，攻取岚城（今山西岚县），在战乱中海云与其师中观遇到了史天泽、李守忠等蒙古的汉军将领，并结为“金石之友”，同时由他们举荐，见到了当时在华北的蒙古军统帅“太师国王”木华黎。这位国王对中观与海云师徒都有好感。可是这时成吉思汗已经不在华北战场，而三年前已经回到蒙古的斡儿朵（宫帐），但经木华黎的推荐，成吉思汗不仅知道了海云及其师

中观的业绩，并赐给他们以“告天人”的称呼。当时成吉思汗给木华黎的圣旨中说：“你使人来说的老长老、小长老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活者，教做头儿，多收拾。那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尔罕行者。”（《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这里我们觉得很有趣的是，成吉思汗将海云等人视为无异于蒙古固有的萨满教的头人“帖卜·腾格里”（告天人），并从这一概念出发，指派他们掌管中原佛教之事。就这1219年，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传诏，命海云及其师中观统汉地僧人，免其差发，因此海云等在同一年从木华黎处得到汉式的法号“寂照英悟大师”和一切的恩赐与礼遇（《至元辨伪录》卷三）。以上为成吉思汗时期汉地佛教与蒙古发生联系的最早记录，而且能够说明汉地佛教与蒙古政权的正式接触是在藏传佛教进入蒙古之前，同时也得到了成吉思汗的敬重与保护。

成吉思汗以后，海云法师个人的活动以及中原地区的佛教，也不断得到蒙古汗室的重视和保护。海云于辛卯年（1231年）十一月得到蒙古可汗窝阔台的宣赐（《通制条格》）。另外，窝阔台即位之初（己丑年，公元1229年）下诏，对中原地区的佛教僧侣全部优免赋役。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因为自金朝末年以来，中原佛教势力屡受惨重打击，其特权早已所剩无几，地位远逊于儒士。窝阔台时期所颁布的关于僧侣和道士同享免差之诏旨，对中原地区佛教而言，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地位，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蒙古汗室的法律性保护。关于中原地区的佛教僧侣得到蒙古汗室的法律性保护的另一个重要证明，是稍后的元代八思巴文官方文书。这些文书的大部分都一开头就提到了“成吉思汗、窝阔台皇帝

圣旨里说道：和尚们、也里可温（按即基督教徒）们、先生们、答什蛮（按即伊斯兰教徒）们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之类的话，也不是没有根据的。看起来，成吉思汗、窝阔台都曾蠲（蠲音娟）免过僧道和基督教士们的差役征发义务。

我们从汉文资料上也进一步看到海云法师在蒙古宫廷的活动。丁酉年（1237年）海云法师从成吉思汗的第二斡儿朵的皇后（可能是忽兰夫人）那里得到“光天镇国土”的法号。（《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但“光天镇国土”“不是蒙古式法号，可能是当时在蒙古宫廷的汉族学者们借二皇后的名义首创的”（札奇斯钦：《蒙古史论丛》（下）、第952页）。在海云法师的一生中，他所做的最有意义的、“并且对后来的历史有着最重要影响的事情，是他在忽必烈帐下谈佛道一事”（同上、第962页）。壬寅年（1242年）忽必烈召海云至漠北。海云向忽必烈讲述佛道时忽必烈提出在佛法中有无治国之道的问題。海云的答复是“世法即是佛道”，意即信奉佛法与采用封建统治方式原来是一回事。当然“这里海云法师是从政治立场说明信奉佛法的必要。这对正在励精图治的青年王子忽必烈来说，实在是有很大的用处”（同上、第963页）。海云与忽必烈的谈佛道，不仅为当时中原地区的佛教赢得了忽必烈的同情与支持，关系到日后中原地区佛教的兴衰，而且还成功地在这位未来的大汗心中留下了佛教教义的种子，成为他后来接受西藏萨迦派教义的重要原因。

海云法师在十三世纪上半期在蒙古汗廷里可以说是备受宠遇的人物。贵由汗（定宗）即位后，海云于定宗二年（1247年）应太子哈剌齐之请，入和林延居太平兴国禅寺。贵由汗

曾“颁诏命师统僧，赐白金万两”（《历代佛祖通载》卷二十一）。1251年蒙哥汗（宪宗）即位，又命他“领天下僧事”（《元史·宪宗本纪》）。这样，海云从成吉思汗时期开始，经窝阔台、贵由、蒙哥等蒙古大汗以及当时的“皇弟”忽必烈等人奉为当时“天下禅宗之首”（《海云印简和尚塔碑》）。海云法师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与蒙古汗室来往密切并主管蒙古汗廷佛教事务的代表人物了。

除了海云之外，原在金代极有盛名的禅宗五家之一的曹洞宗僧侣万松行秀（1166—1246）的弟子雪庭福裕（1203—1275），曾受贵由汗之命，居漠北和林兴国寺。蒙哥汗时期在和林大建佛寺，以福裕主其事。忽必烈（元世祖）即位后，福裕的地位有显赫的变化，“命总教门事”（《道园学古录》卷八《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看来，十三世纪上半期在蒙古汗廷中汉地佛教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势力最盛，海云法师和万松行秀及其弟子们的地位很高、关系密切。

除了中原地区的汉族佛僧而外，西域的一些喇嘛也正在蒙古汗廷中活动。据蒙汉文资料记载，有一位喀什米尔的僧人叫那摩，他在蒙古汗廷中掌管过蒙古汗国的释教事务。他曾得到成吉思汗以后的三代蒙古汗的敬重。蒙哥汗曾封他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但资料没有告诉我们此事发生在某一年及其详细经过。据清末蒙古史学者屠寄的说法，蒙哥汗立那摩为国师是在蒙哥汗二年（1252年）十月（《蒙兀儿史记》卷六）。那摩在蒙古汗廷的活动，到了1258年，以蒙哥汗的诏令，佛教与道教的代表人物展开一次大辩论中最为突出。这次辩论，史称“佛道之争”。那摩是当时参加辩论的佛教界居第一位的人物。这场辩论以佛家的胜利而告终。